

文化大革命與現代日本

加美光行

一 60年代日本社會危機與中國文革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僅僅衝擊了中國一國的「動亂」，它也席捲了亞洲、非洲、中東、中南美洲等第三世界乃至歐美，因此可以說，它是全球性的同時代「政治運動」。至少對歐美、日本等經濟發達國家而言，文化大革命意味着對本國的政治秩序和以美國為支配者的既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而不是動亂。

為了理解文革何以對日本產生極大影響，首先有必要認識當時日本的社會狀況。在文革爆發的1960年代，日本一方面按照池田勇人內閣的收入倍增政策實現了令人驚異的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面臨着社會矛盾普遍激化。1966年至1969年間，熊本縣和新瀉縣阿賀野川的水俣病、四日市喘息病、富山縣神通川疼痛病引起所謂「四大公害訴訟」。公害同時還造成極其嚴重的環境污染，日本政府放任公害擴大的做法引起社會各階層的憤怒。此外，這一時期的藥害訴訟也接二連三。例如，服用安眠藥肱胺呱啶酮，造成了大量畸形兒，服用整腸劑奎諾仿造成了亞急性脊髓視神經病的患者群，患者和受害者紛紛狀告醫藥公司和政府。再者，這一時期，政府為了興建東京國際新機場，強行徵用千葉縣成田市三里冢耕地，引發大約一千戶共三千農民反對機場施工的鬥爭。這一事件暴露出日本戰後經濟發展中不斷優先加強工業、輕視農業的偏向。

上述環境污染、公害、藥害與日本拋棄農業的政策，在1960年代集中出現，反映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在高速增長的政策下，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體的城市規劃與主要工業企業相勾結，重視企業利益而輕視居民利益；第二、迷信一直支撐着產業高速發展的現代科學技術以及醫療科學。例如，公害病的真相遲遲得不到揭露，被認為是科技人員以及醫生與工業企業勾結，扭曲了理應具有客觀性的科學判斷。

在這種背景下，首先由東京大學的兩個學院——直接參與中央和地方政府城市規劃設計的工學院城市工學科以及醫學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實習生，開始對教授激烈批判，終於導致了1967年的無限期罷課。其連鎖反應波及別的大學，至1968年1月，全國有116所大學先後舉行罷課。當時在中國，肇始於紅衛兵運動和青年工人造反運動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

二 二戰後日本的行為軌迹

日本在1960年代集中出現的環境污染、公害、藥害及拋棄農業的政策等社會問題，是我們理解文革何以會對日本產生極大影響的關鍵。

日本在19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所引起的社會矛盾總爆發，追根溯源，是日本自1945年8月戰敗以後20年演變的必然結果。

在麥克阿瑟的主導下，日本接受美國援助，奠定了戰後復興的基礎。1950年6月，美國以聯合國軍（麥克阿瑟擔任司令官）的名義介入朝鮮戰爭，出現了對日本的特殊需求（朝鮮特需），促使日本經濟在1952年以後日漸景氣。另外，在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情況下由美國主導的1951年9月舊金山和會中，日本



獲得了西方同盟各國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的恩惠。由於受到美國的壓力，沒有參加這次和會的台灣蔣介石政權，也在1952年4月締結的〈日華和平條約〉中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請求權。結果，其他亞洲各國在美國的壓力下均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的要求。因為除了中國、北越、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外，亞洲各國在戰後的國際形勢下都必須仰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就這樣，本來要為戰爭付出巨額賠償的日本，在美國的大力庇護下得以卸掉有關負擔。

因而可以說，日本在戰敗後的行為軌迹，不過是明治維新以來現代「日本的追隨歐美、拋棄亞洲」既定政策的延續。

毫無疑義，追隨美國的路線是日本戰敗後的奇迹性發展的基礎。美國還在締結〈舊金山和約〉的同時，就與日本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從而取得了美軍在遠東所有地域進行軍事行動時可以自由使用日本本土軍事基地的特權。日本此後被置於美國軍事保護之下，軍事費用負擔減輕到僅僅足以維持保安隊（在1954年改稱自衛隊）。就這樣，日本幾乎淪為美國的附庸國，標榜放棄戰爭的「憲法」第九條實際上成為具文。1950年代中期美蘇開始核對峙以後，日本就完全置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下。這意味着，日本無條件地服從了美國在戰後國際秩序中所尋求的美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目標。

美國以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為藉口，正式介入越南戰爭。1965年2月，開始了轟炸越南北方的洞海「北部空襲」。不言而喻，日本本土和沖繩的美軍基地，成為美國在越戰期間的重要基地。本來，日本在1964年由於所得倍增計劃造成供給過剩，使其陷入戰後最大的經濟危機（債務1,000萬日元以上的企業破產案件達4,212件），然而由於越南戰爭的特殊需求（越南特需），使日本能夠在1965年重新回到增長局面。繼朝鮮戰爭之後，日本又一次從他國戰爭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由此，必然引起日本試圖擺脫美國支配的運動。最初，是以青年學生組織「全學連」為核心的反對改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60年安保鬥爭」的運動。這場鬥爭曾嚴重受挫，一時消沉平息，但其後一直作為日本社會運動的動力而潛伏着。在美國正式介入越南戰爭後，上述運動也就演變為一場阻撓美國稱霸世界的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運動。

1964年，由於所得倍增計劃造成供給過剩，日本陷入戰後最大的經濟危機，然而由於越南戰爭的特殊需求，使其能夠在1965年重新回到增長局面。繼朝鮮戰爭之後，日本又一次從他國戰爭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三 日本革新勢力禮讚中國的精神動因

正如林彪在1965年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提出以「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那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旗幟鮮明地採取了對抗美國企圖支配世界的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走向，與上述日本戰後二十年的走向是完全相反的。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中國曾經有意與東西方兩大陣營建立外交關係，並沒有打算閉關自守。但是，由於美國頑固拒絕承認中國，加上朝鮮戰爭

爆發，更使兩者陷入了相互敵對的狀態。中國被迫捲入戰爭。結果，中國在被封鎖的狀況下不得不截斷與西方各國的關係。

朝鮮戰爭，是戰後君臨國際社會的最強大國家美國，與代表貧窮的亞洲的中國之間進行的一場持續了約三年的戰爭。由於多數的日本人認為，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是導致1945年8月的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因此，他們把日美之間的物質的、經濟的力量懸殊作為戰敗的根本原因。在戰後不久的日本人心中，存在着不能或不應與美國進行對抗的意識。

對於這樣的日本人來說，貧窮的中國敢向富裕的美國挑戰，真是驚人之舉。何況中國還出乎意料地把美國逼入困境，使之不得不在1953年7月接受事實上等於投降的板門店休戰。其結果大大改變了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從這時起，肯定追隨美國、堅持反共的保守勢力開始把中國視為威脅；而那些反對追隨美國、主張容共的革新勢力（特別是革新的青年），則隨着民族主義熱情的高漲而加強了對中國的讚美。

朝鮮戰爭大大改變了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從這時起，肯定追隨美國、堅持反共的保守勢力開始把中國視為威脅；而那些反對追隨美國、主張容共的革新勢力，則隨着民族主義熱情的高漲而加強了對中國的讚美。

這種讚美中國的傾向，成為後來革新勢力中一部分人支持文革、讚美毛澤東的初始遠因。這些人發覺在中國內部蘊藏着某種戰勝美國的強大力量。這既然不是物質力量，就只能是精神力量。於是，人們開始設想中國人在精神上、倫理上的崇高性，它與日本這個民族在精神上、倫理上的墮落適成對比。

早在朝鮮戰爭期間，對戰後日本文學界深具影響力的竹內好在1951年4月出版的《中央公論》月刊上發表了〈毛澤東評傳〉，高度評價充滿了抵抗精神的中國民族主義，開禮讚中國之先河。日本政治學界領袖丸山真男也高度評價了1956年5月由毛澤東發起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運動，認為它是剛成立的革命政權為形成真正的民主主義國家的嘗試。而對鳴放運動之後發生的反右派鬥爭的負面影響，當然是被忽略了。1958年毛澤東又發動了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即使到1960年代前期從香港傳來其失敗的片斷消息之後，它仍然得到高度評價，肯定的議論在日本各界仍佔主流。

1960年代中期進入高潮的越南戰爭與朝鮮戰爭具有同樣的格局——貧窮的亞洲小國越南，為了民族的統一和獨立而挑戰強大的美國。那些持批判美國態度的日本人奮起支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越共）和北越，並十分嚮往越南人不屈服於美國物質力量的強韌精神力量。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正好與越南戰爭的持久戰化在時期上相重疊，因此，當時支援越共和北越的日本革新勢力，對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過份的精神主義尚缺乏批判觀點。

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中國在戰後國際局勢下，選擇了與日本背道而馳的發展路向而發動的運動。因此，那些把戰後日本走向視為人性墮落之路而大加撻伐的日本人，其否定的程度愈高則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傾向也就愈強。例如，中國在1950年代後期的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大力強調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精神主義極其濃厚，後來大躍進、人民公社以慘重的代價而告失敗。但是，在1965年、1966年支持越南戰爭、憎恨美國憑藉巨大物質力量統治世界的日本人，做夢也沒有想到中國的精神主義會失敗並為此付上沉重的代價。所

以，在文革期間把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困難時期的調整政策作為生產力主義加以批判，稱他們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加以打倒的造反運動，贏得了傾向精神主義的日本人的共鳴和無條件的接受。

四 日本的兩類文革讚美派

不得不指出，在傾向於讚美中國文革和毛澤東的日本人中，有些人過份狂熱，陷入了盲目讚美。這些人就是在日本戰後的現代中國研究中佔主流的研究者，他們究竟有甚麼樣的經歷呢？

戰前日本的中國研究大體分為兩部分人。一是大學的研究機構，以研究古代到明末清初歷史上的中國為主。另一則是任職於滿鐵研究所、東亞研究所等由日本政府和軍部管轄的國策研究機關的研究員，他們以研究十九世紀後被列強置於半殖民地統治下的清末中國，特別是1930年代以後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國為主。在這些研究者中，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有日本共產黨黨員。戰後，大學研究機構很難滿足研究現代中國的社會需求，這時，戰前任職於國策研究機關的研究人員，一躍成為現代中國研究的主角。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之所以在戰前加入國策研究機關，首先是為了逃避軍國主義的政治鎮壓。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出於亞洲主義的感情，夢想與中國聯合起來，因而對近衛文磨（首相）、石原莞爾（關東軍參謀）的東亞同盟論等產生共鳴，積極加入國策研究機關。例如，戰後最早的研究機關是1946年成立的社團法人中國研究所。以這個中國研究所為母體，1951年5月又組成現代中國學會等，參加者很多是上述的研究者。他們的基本思想特徵不妨概括為：把亞洲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具有亞洲社會主義的傾向。

在戰後重新開展中國研究之際，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自己戰前的研究最終成了日本軍部侵略中國的工具（這顯然與日中同盟的主觀願望相反），一直抱有強烈的贖罪意識和自責觀念。朝鮮戰爭之後，社會主義中國顯示出有足夠力量與美國對抗，他們的研究便轉向對毛澤東和中國盲目崇拜。由此，他們無條件地讚美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文革。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現代中國研究者對文革的盲目讚美，與本文開頭述及的奮起批判日本在1960年代高速增長期中出現的環境惡化、公害、藥害、拋棄農業等現象的革新勢力對文革的肯定和支持，兩者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因為前者的文革禮讚，是以對自己在戰前的研究進行贖罪的、過去指向的意識為機軸的，而後者（革新勢力）對文革的共鳴和支持，則是以對1960年代的日本現實進行批判的、現在指向的意識為出發點的。基於現在意識的革新勢力的主要關懷是批判戰後日本人在精神上、倫理上的墮落，而不是毛澤東的中國，所以它只對中國的精神主義、倫理主義產生共鳴。

基於現在意識的革新勢力對文革的共鳴和支持，是因為它的主要關懷是批判戰後日本人在精神上、倫理上的墮落，而不是毛澤東的中國，所以它只對中國的精神主義、倫理主義產生共鳴。

五 日本的文革批判派之一：馬克思主義者

日本的文革批判派大體上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日本共產黨的主流派；第二種類型是保守的既得權勢階層；第三種類型是現代化論者。總的說來，他們對戰後日本追隨美國的路線不是加以否定，而是全面地、或者部分地肯定。

當然，日本並非沒有文革批判派，他們大體上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總的說來，他們對戰後日本追隨美國的路線不是加以否定，而是全面地、或者部分地肯定。第一種類型是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宮本顯治等日本共產黨的主流派。第二種類型可以舉出戰前主導了侵略戰爭的、保守的既得權勢階層。第三種類型是原則上肯定西歐式現代化的現代化論者，他們把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視為前現代的產物而加以批判。

首先，讓我們來考察第一種類型——馬克思主義者。

戰敗後不久的日本共產黨（日共），鑒於美國佔領軍（GHQ）的進駐使在軍國主義統治下一直被囚禁的宮本顯治等領導人獲得釋放的事實，曾經有把佔領軍視為「解放軍、民主勢力」的傾向。一般而言，日共基於歷史唯物論把資本主義發展看做歷史發展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為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有必要進行民主改革，藉以瓦解支配戰前日本的半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軍國主義的體制。1945年11月，美國佔領軍着手解散舊的四大財閥——三井、三菱、安田、住友，進而在同年12月開始以「把日本農民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實現日本農村的民主重建」為口號推行農地改革，並實施其他一系列的「民主改革」，日共對此均給予強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日共以其涉外領袖之一的野坂參三擁有中共黨籍並曾逗留延安的事實表明，它從國共內戰時期以來就支持中共政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更是全面支持。加上前面述及的那些戰前任職於國策研究機關的黨員們基於贖罪意識而對中國的讚美，進一步加強了日共對中國的支持。

美國佔領軍進行「民主改革」幾年之後，在1948年左右，按照美國政府的方針發表了所謂「日本是阻止共產主義伸張的屏障」的聲明，強化了反共主義傾向，並着手肅清共產主義者的「掃紅」運動。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敵視中國的態度十分明顯。為此，日共逐步改變從前支持佔領軍的立場，至1951年為止把方針轉換成反美暨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儘管如此，日共並沒有改變對美國在佔領日本之初進行「民主改革」的態度，基本上一直支持日本追求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方向。

美國佔領軍在1948年左右發表了所謂「日本是阻止共產主義伸張的屏障」的聲明，強化了反共主義傾向，並着手肅清共產主義者的「掃紅」運動。為此，日共逐步改變從前支持佔領軍的立場。

日共這種支持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立場，即使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的環境惡化、公害、藥害、拋棄農業等問題激化的階段也沒有變化，因而不能積極地支援提出上述問題的受害者以及農民的運動。

同樣，對於毛澤東的中國，在其利用資本主義、推行富農經濟政策，或者導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日共一直給予全面的支持。在這一點上，黨內那些出於贖罪意識而倒向支持毛澤東和中國的一部分人與主流派之間並沒有發生任何矛盾。但是，當毛澤東的中國在1958年以後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一舉實現共產主義，因而推行人民公社、大躍進政策時，日共主流派便開始持批判態度。

最後，在1966年3月，正在中國訪問的日共宮本顯治代表團就是否批判蘇聯的問題與毛澤東發生對立，終於引起日中兩國共產黨的決裂。由於日共、蘇共對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政策等冒進做法都持否定看法，其結果是令那些一直以贖罪意識為原點而大力讚美毛澤東和中國的日共黨員分裂，他們或與黨的主流派一起批判中國，或抵制主流派並繼續支持中國。匯入主流派的有米澤秀夫、尾崎莊太郎、金丸一夫等人；繼續支持中國的可以舉出岩村三千夫、安藤彥太郎、齊藤秋男等人。後者全部被日共除名。在文革期間，這批人是無條件的毛澤東和中國的禮讚派。此外，禮讚派中還有較年青的新生代黨員——菅沼正久、新島淳良等，他們也被黨除名了。

總之，1960年代後期，當青年學生針對經濟高速增長所引起的社會矛盾以及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而掀起政治運動，其中一部分人禮讚文革和毛澤東時，日共不僅沒有附和這種潮流，甚至與之敵對。

在文革結束後，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日共主流派才轉向支持這一政策的方向，但是，他們依然甚為關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問題，仍有批判中國政府政策的傾向。

六 日本的文革批判派之二：保守的既得利益者

第二類文革批判派大致包括以下兩種人：一種是在日本戰敗後被定為甲級戰犯的人。1948年，在他們服刑期內突然被麥克阿瑟司令部釋放，再次返回統治階層。在1957年坐上首相交椅並在60年安保鬥爭時受到國民的激烈批判而不得不引退的岸信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另一種是戰前作為財閥與軍閥政權相勾結並支持戰爭的實業家。在戰敗後不久，麥克阿瑟佔領當局進行財閥解體，他們的經濟基礎一度被剝奪。但同樣是在1948年左右，這些舊財閥突然獲得免罪符，重新取得主導財界的地位。

如前所述，麥克阿瑟司令部在戰後佔領日本之初曾進行財閥解體、農地改革等大規模的民主改革，但是以1948年為轉折點，美國為了把日本列島作為與蘇聯以及共產陣營進行軍事決戰的前線基地，於是，加速戰後日本復興使之能立即發揮前線基地的功能，就成為美國佔領政策的最高目標，而扶植戰前舊統治勢力復辟就是達致此目標的捷徑。一般稱此一轉向為麥克阿瑟佔領期間的「開倒車」。1955年實現保守合流，自民黨登上政壇，其主流派與支持自民黨的財界主流派，正是以戰前的舊統治勢力為主體而復活的社會勢力的代表。復辟後的舊統治勢力具有濃厚的反共產主義色彩。他們理所當然地傾向敵視成立於1949年10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擁護在台灣的蔣介石反共政權。因此，他們一貫批判毛澤東指導下的中國，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文革的批判，只不過是反共路線的延長而已。

不過，他們並非沒有期望獨立於美國的民族感情。只是他們基於戰敗的經

當毛澤東推行人民公社、大躍進政策時，日共主流派開始持批判態度。最後，在1966年3月，正在中國訪問的日共宮本顯治代表團就是否批判蘇聯的問題與毛澤東發生對立，終於引起日中兩國共產黨的決裂。

美國為了把日本列島作為與蘇聯以及共產陣營進行軍事決戰的前線基地，於是加速戰後日本復興，而扶植戰前舊統治勢力復辟就是達致此目標的捷徑。



驗，抱有所謂與美國敵對的行為就會導致日本滅亡的強烈危機意識，因此試圖通過追隨美國來加速日本的復興和發展，以實現最終獨立。在追隨美國的政策的前提下，他們認為對中國以及亞洲進行侵略並沒有甚麼錯，錯只錯在與物質力量上優越於日本的美國為敵。他們認為，對他們的罪行無論是進行裁斷還是給予寬恕的並不是中國及亞洲各國，而是美國。復辟的統治勢力之所以有如此想法，歸根結底是與明治維新以來的歐化主義和對拋棄亞洲(即脫亞入歐)的想法有關。它對現代日本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和大國化終至侵略亞洲的路線毫無反省之意，相反倒使得舊的路線延續。因此，在他們對毛澤東的中國乃至文革的敵視和批判意識中，不僅有反共產主義，而且亦有輕視(蔑視)亞洲本身的意識在作祟。

七 日本的文革批判派之三：現代化論學者

最後，看看第三種類型的日本文革批判派，亦即是傾向於現代化論的學者。他們在戰後出於樸素的親美感情，積極學習美國的各種先進科學，特別是國際政治學，並以歐美的近代化模型作為批判的標準。那麼，他們是在何種背景下接受了美國的國際政治學影響呢？

在戰後早期，美國的對外政策並非不分青紅皂白的敵視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無條件的反共主義。1946年至1948年，由凱南(G. Kennan)以及摩根索(H. Morgenthau)提出後來被美國政府採納的冷戰理論影響了局勢。凱南和

摩根索指出蘇聯繼承着沙俄以來的對外擴張傳統，但他們也否定了軍事進攻蘇聯的可能性，僅僅強調在蘇聯影響下存在着社會主義革命向西方各國滲透的危險性。鑒於這些看法，他們提倡採取非軍事性的對抗政策。這一冷戰理論奠定了戰後美國新的國際政治學基礎。

冷戰理論的國際政治學反對把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視為惡魔的過份「價值規範性」的解釋，而主張把蘇聯視為與沙俄同樣的國家「現實主義」的解釋。它在方法論上的特點之一是：只求在不驚動對方的狀況下收集信息，不求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戰後一度主導着美國的中國研究的費正清 (J.K. Fairbank)，基於與冷戰理論同樣的想法，在哈佛大學與麥科伊 (Don Mackey) 等一起組織「國際地域研究專門委員會」，開創了「地域研究」的新領域。他們主張美國政府應放棄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採取一概敵視中共政權的做法，相反地，應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接受中共政權為形成戰後國際秩序的成員之一。在研究方法上，他們也採用對蘇聯的那種觀察學，這就是被稱為「中國觀察學」的方法。1950年2月，上議院議員麥卡錫 (Joseph McCarthy) 掀起了「掃紅旋風」，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後，費正清等人的中國研究也受到批判。美、日、韓、台之間締結了敵視中國的相互防衛條約，形成了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

到1960年代初為止，美國這種敵視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沒有影響日本的中國研究，只有日本政府和財界保守勢力追隨。相反，費正清的中國研究方法則普遍影響了日本的年青中國研究者，並被他們採納。參加1953年6月結成的亞洲政經學會的部分學者，如石川忠雄、衛藤瀋吉等，就是有代表性的實例。

上述學者對日本保守的統治勢力敵視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觀點持懷疑態度。他們以歐美現代民族國家的模式為評價標準，認為中共的政治支配具有有效性、安定性以及合理性。例如，他們根據西歐的標準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視為現代性民主化過程，也把反右派運動看做是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合理的調整政策。這一派還認為戰後國際社會應該給予毛澤東的中國正當地位。

由於他們的基本觀點是肯定歐美現代化模式，因而也肯定戰後日本的追隨美國政策。在這一點上，雖說同樣是支持毛澤東的中國，但其立場與激烈批判追隨美國政策的革新勢力的研究者完全不同。

這些傾向現代化論的學者在文革爆發時才開始轉向批判中國，原因是從現代化論來看，文革中狂熱的毛澤東崇拜，意味着出現了與韋伯所謂科層制的形式合理性所不同的超凡人物統治以及非理性、不合理的前現代性。由此可見，中國的內政外交不是取決於民意，而是由一部分獨裁者所肆意左右。根據這一觀點，岡部達味與衛藤瀋吉一起分析中國外交，得出了掌握最高權力的獨裁者任意決定外交方針的結論。因而，他們認為在分析中國外交時，必須注意中國當局的權力鬥爭動向。在這裏，認為不具備國民合意的基礎的前現代國家中國不能成為國際秩序的一員的立場十分露骨。

總的說來，支持日本的追隨美國政策、站在現代化論立場批判文革的人們，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加強與政界、財界主流的結合。儘管如此，這一

美國的冷戰理論反對把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視為惡魔的過份「價值規範性」的解釋，而主張把蘇聯視為與沙俄同樣的國家「現實主義」的解釋。它在方法論上的特點之一是：只求在不驚動對方的狀況下收集信息，不求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

現代化論的學者在文革爆發時才開始轉向批判中國，原因是文革中狂熱的毛澤東崇拜，意味着出現了與韋伯所謂科層制的形式合理性所不同的超凡人物統治以及非理性、不合理的前現代性。

類型與其他兩種類型加在一起，文革批判派在整個文革期間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中只不過是少數派，多數派一直是毛澤東的支持派、文革禮讚派。

八 不應忽視的傾向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接着1972年2月的尼克松訪華，同年9月的田中角榮首相訪華等一連串變化，使文革期間一直把毛澤東的中國看作反美解放鬥爭根據地的禮讚派受到很大衝擊。採取追隨美國路線的日本政界、財界主流派，根本無須改變其親美立場，他們的戰爭責任問題也沒有被追究，卻依然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扮演日中友好運動的主角；相反，從前的毛澤東禮讚派、中國禮讚派反而被趕到舞臺的邊緣。雪上加霜的是，在1975年越南戰爭終結的同時，中國和越南的關係迅速惡化，1979年1月爆發的中越戰爭使事態變得無可逆轉。

在後冷戰期的今天，把1960年代高速增長期日本社會中出現的社會矛盾作為日本人的精神墮落加以批判的觀點，漸漸被人忘得一乾二淨。與此相應，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正受着那種把中國視為不成熟的落後的資本主義而居高臨下地加以審視的優越感的支配。

最後，中共在1981年6月的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歷史決議」，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文革真相，並從總體上否定文革。此時，日本大多數文革支持派都對自己的觀點作了180度的轉變，紛紛加入現代化論的行列。因而，一直是少數派的現代化論派取代了文革禮讚派，一躍成為學界的主流，甚至日共主流的中國批判派也逐步參與到現代化論派。其結果是，在後冷戰期的今天，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仍對冷戰期間出現的中國觀察學方法抱有很大興趣。

這樣一來，把1960年代高速增長期日本社會中出現的社會矛盾作為日本人的精神墮落加以批判，因而支持文革的批判現狀的觀點，在1980年代漸漸被人忘得一乾二淨。與此相應，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也在不加批判地肯定日本現狀的基礎上，正受着那種把中國視為不成熟的落後的資本主義而居高臨下地加以審視的優越感的支配。

由此必須認識到，日本人否定文革與中國人否定文革，在許多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這樣一種令人擔憂的現實：今天，日中之間在理性的、冷靜的相互批判中了解對方已難以存續，而且這種危險性正在日益增長。

季衛東 譯

加加美光行 1967年東京大學社會學科畢業，曾任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教授等職，1991年開始任日本愛知大學法學系教授。